

兼容並包

紀念一位教育行政工作者

蔡元培先生

譚宇權

前言

如果你丟一塊石子在一池止水的潭中央，一圈又一圈的微波就會從中盪漾開來，而且愈盪愈遠，愈盪愈大。北京會為五朝京城，歷時一千餘年，因此成為保守勢力的中心，慈禧太后就在這裏的龍座上統治着全中國。光緒皇帝在一八九八年變法維新，結果有如曇花一現，所留下的唯一痕跡是國立北京大學……但是在北京大學裏，却結集着好些蘊蓄珍珠的活貝；由於命運之命的擺佈，北京大學終於在短短三十年歷史之內，對中國文化與思想提供了重大的貢獻。

在靜水中投下知識革命之石的是蔡子民先生（元培）！

距蔡元培先生逝世十七個年頭後，繼任的北大校長蔣夢麟先生在他著的西潮中文版裏，用文學的筆觸寫下這段深刻的回憶。

在中國現代史上，蔡元培先生無疑是一位開山的大師和近百年來中國維新的嫗姆（註1）。他的成就祇有真正研究現代史的人才配估量，然而，在蔡先生剛好一百歲的今天，我們翻開前人的文獻，探討一下這位死去二十多年的人，不禁發問：為什麼他能在中國最近的歷史上創造了石破天驚的事業？為什麼他會促成中國一次空前偉大的文藝復興運動——新文化革命？

當我仔細研讀他的遺文和那個時代的歷史後，我的答案是：這一切的成就就是因為蔡先生是個深深具有「雍容」修養的人，也就是說，他具備強烈「兼容並包」的精神！

民國六年，蔡先生出任北京大學校長以後，他的教育行政上的主張，一貫表現了這種精神；他在答覆林琴南先生質問辦學方針時說：

對於學說，仿世界各大學通例，循「思想自由」原則，取兼容並包主義，與公所提之「圓通廣大」四字頗不相背也。

北大月刊發刊詞中，他亦表明：

大學者，囊括大典，網羅衆家之學府也。

他晚年回憶自己在北大那段時期，也承認了此種兼容的信念。他說：

我素信學術上的派別是相對的，不是絕對的，所以每一種學科的教員，即便主張不同，若是一言之成理，持之有故的，就讓他們並存，令學生有自由選擇的餘地。（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）

他這種精神對那一個時代的重要性，也許不為今天一般人所瞭解；可是我們若仔細思考一下：在一個思想極度保守，學術唯我獨尊的社會裏，一個人叫大家不要只尊儒家，而且又強調「思想自由」「萬物並育而不相害」之類觀念的話，是何等困難！是要遭遇何等大的阻力（註2），然而深信「思想自由」是促成文化蓬勃的主要動力的蔡先生（註3），却毅然作了這種決策；所以北大後來有前進份子如胡適之、陳獨秀、錢玄同、劉半農等和復古者如林琴南、辜鴻銘等人的並存（註4）。由於他此種涵養，加上一股新舊學者互為消長的努力，使中國長期醞釀了新的文化運動，使北京大學成爲一個文化中心。終於，在民國八年，中國爆發了一次從來沒有過的青年愛國運動——五四（註5）。

五四運動可以說是新文化運動引發出來的（註6），雖然這個運動的結果，並不如蔡元培先生和當時一般學者所預期（註7），然而，那時的南方革命領袖 孫中山先生很快就體驗出這次運動將在中國政治史上的意義，他於一九二〇年一月九日寫給海外黨部的信件裏，感動地說：

自北京大學學生發生五四運動以來，一般愛國青年，無不以革新思想為將來革新事業之預備；於是蓬蓬勃勃，發抒言論，國內各界輿論，一致同情，各種新出版物，為熱心青年所舉辦，紛紛之偽政府，猶且不敢櫻其鋒。此種新文化運動……倘能繼續增高，其將來收效之偉大且久遠者，可無疑也。吾黨收效革命之成功，必有賴於思想之變化……故此種新文化運動，實為最有價值的舉。（孫中山致海外國民黨同志書）

國父孫先生對五四的論斷，在今天史書對這個運動的批評中，是最公平的（註8），所以現在如果我們想要瞭解五四運動的價值和和文化運動的真義，不能不注意 國父說的「此種新文化運動……倘能繼續增高，其將來收效之偉大且久遠者，可無疑也」幾十個字的含義，更不能不想起新文化運動中一位苦口婆心的嫗姆——蔡元培，曾在一個保守的社會環境中發射出來的「兼容並包」精神的光芒！

自從蔡元培先生，以七十四歲（民廿九年）高齡在中央研究院院長任內突然去世時，總計他在教育行政崗位上整整工作將近二十年（註9），二十年或更長的時間，蔡先生所表現的精神，沒有不是令人敬佩的「雍容」性格；這種獨特的性格，就是蔣夢麟筆下的中國大臣之風；可是最難得的蔡元培精神，不祇是中國環境造成的；早歲的舊式教育和環境，他二十八歲之後的革命背景，和四十一歲以後留學的生活和見聞，終於鑄造一位學貫中西，兼容新舊的人。

從蔡先生一生的歷史來看，二十八歲以前完全受舊思想的薰陶是一段。二十八歲後，他投身於 孫中山先生革命的巨流中，那正是西方思潮激烈衝擊中國社會的時候。等到他由外國帶回各種西方文化，要大力運用之際，又適逢中國近代思想大奔放的初期，因此蔡元培先生一生的思想演變，與中華民族近百年來的思潮和歷史，發生不可磨滅的關係；因而，我們如果要從這位逝世的偉人的文獻中，捕捉他舊日的精神，首先必須從近百年來中國社會政治的劇變中，透視整個時代的精神。

蔡先生時代的中國社會和政治的背景

西曆一八三九年，民國前七十三年，鴉片戰爭，實在是中國社會大變動的起點；它不但代表西方文化直接而普遍地湧進中國的開始，而且可說是徹底地敲醒中國人好夢的第一響！

從這以前，中國社會受西方影響可以說是間接的，被視為中國社會支柱的文人，雖然可以由外國傳教士那邊得到一些西方文化的消息，但仍是局部的，片斷的，因此不為一般人所重視；而他們的生活還是一向的幽閒，他們的社會仍是往日的保守。

然而，自鴉片戰爭以後，西方文化却在戰爭炮火間帶到中國；從中英南京條約（一八四二）到和八國訂下的辛丑條約（一九〇一），沒有一

年停止戰亂，沒有一回對外和約缺少毀權辱國的記錄；這種種可恥的條約，真是把向來唯我獨尊的中華民族的面子丟盡了，接踵而來更可怕的事實是——一個個「地大物博」的中華，讓世界列強的勢力分別佔領了；不用說，內河航行權、領事裁判權、開礦權和造鐵路權被他們佔有了。實際上，這時的中國，已完全在各國勢力的籠罩之下；我們看美國國務卿海約翰先生（John Hay）主張「中國門戶開放和各國在華經濟利益平等」，（一八九九）時，西方國家瓜分中國的情形如下：俄國占領北部、東北、西北的絕大部份，英國的勢力由江南一直延伸到西藏，還包括廣東、海南島。法國是以昆明為中心的西南部，德國在山東，日本則居福建。

當中國的社會蒙受極大外力逼迫之際，很不幸的，它的朝廷裏，也日益腐敗。

有一件很明顯的例子，可以證明這種跡象由來已久；清嘉慶皇帝把乾隆帝時代的宰相和坤抄家處死時，發現他的家產總共有一百零九號（一號表示產業的一批，全部約值八億兩銀子），而當時清朝歲入為七千萬兩銀子，所以和坤貪污的數字已超過清國庫十年收入有餘（註10）。

任高官的人，可以大量地將國家的公款據為己有，做小官的人，自然也能由百姓身上進行敲榨；國家政治敗壞到這個地步，人民的生活給官吏壓迫至絕境，但是政府裏的首長仍作欺上瞞下的勾當；道光年間的宰相曹振鏞會對皇帝這樣說（註11）：

今天下承平，臣工好作危言，指陳闕失以邀時譽。若濫罪之，則蒙誣諫之名。惟有挾其細故之奸謬者交部嚴議，則臣下震於聖明，以為察及秋毫，自莫敢或縱。

外國經濟力的入侵，已經使中國社會經濟極度蕭條，再加以中國政府本身的敗壞與貪官，總結起來，便是中國經濟的總崩潰！我們看「清史紀事本末」裏描寫的社會的混亂，和人民生活的慘狀，便可想見當時中國政治和社會落到何等地步！歸納起來說，當日內憂外患的情況有三：

- (1) 五口通商，中國舊工業完全變成外人的附屬品。
- (2) 軍事方面，年年用兵，年年賠款，政府不得不無限制增稅，結果還是人民倒嚮。
- (3) 光緒即位二十餘年間，年年天災。

在中國歷史上，飽暖足以構成人民安定的必備條件。可是當時人民非但受過年年遭傾家蕩產和流離失所的苦日子，而且還需儘量縮緊褲帶，才能應付官衙裏的稅吏。在這種艱苦的歲月中，一般老百姓想到自己的慘狀，又看到社會上的工商業實際上完全是洋人在把持。國家弄到這麼不公平，也是洋人的侵略造成的；從這個很簡單很容易的聯想中，大多數中國人便有了普遍的結論：認為中國一切禍亂根源是外國人，而外國人含有一侵